

1988年1月,中共上海市委决定任命我为新民晚报社副总编辑兼党组副书记。我深知:《新民晚报》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光荣的传统,这首先归功于一代又一代德高望重、学识渊博、功底深厚、经验丰富的老报人。所以在未正式报到前,我首先拜访了晚报的几位元老,聆听他们的教诲。如今虽然26年过去了,但他们当年的亲切话语言犹在耳,难以忘怀。

赵超构先生是中国晚报界的泰斗,是《新民晚报》的终生社长,在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的陪同下,我登门拜访了他,第一个向他报了到。赵超老(晚报同仁都习惯于这样称呼他,也有叫他“老将”的)除双耳需借助助听器帮忙外,显得精神矍铄,谈笑自若,他首先对我到晚报工作表示欢迎,并说你是从《青年报》来的,首先要注意把我们报社的青年同志发动起来,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。当记者,尤其是青年记者,一定要脚勤、脑勤、手勤。搞报纸工作,就是要集中精力,专心致志搞业务。他对某些人不务正业,热衷于去搞多种经营、去赚钱,很不以为然。赵超老虽然话语不多,但话题涉及到我的工作方向,涉及到青年记者的素养问题,真是言简意赅,语重心长。最后,当龚心瀚同志征询赵超老是否有兴趣到香港去看看时,他

## 首次聆听晚报元老的教诲

◆ 丁法章

### 【作者简介】

丁法章 1940年生。江苏盐城人。196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。曾在江西《赣中报》《江西日报》任职,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,上海《青年报》任总编辑,《新民晚报》任党委书记、总编辑,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任党委副书记、副社长等。2003年退休。1992年被评定为高级编辑,获国务院特殊津贴。主要兼职:上海市新闻学会名誉会长,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,北京吉利大学副校长兼新闻传播学院院长,复旦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等。主要著作:《新闻评论学》《我当晚报老总》《丁法章文集》等。

连忙摆手说:“没有兴趣!没有兴趣!”归途中我们几个同行者都不胜感慨,觉得赵超老处处严于律己,为人风范,名义上虽不是共产党员,实际上却是真正的党外布尔什维克。后来听人介绍,对于调我到晚报工作,几个月前市委宣传部曾征求过他的意见,当时他说对我不甚了解,

但表示没有异议。后来,当老束将市委、市政府对我的任职文件已经下发的消息告诉他时,他很高兴,并提议报社应请我吃顿饭。对此,报社的另一位老领导朱守恒对我说:“这在赵超老是不多的,可见他对你重视并且怀有期待的。”

束纫秋(晚报同仁都惯称他为老束)先生是晚报位高权重的人物,是真正的当家人。我想,既然我到晚报是他提议的,想必他对我一定抱有期望。虽然几天前在市委宣传部,由龚心瀚副部长介绍,我们已经见过面,进行了初步交谈,但我觉得远远不够。于是,在未报到前几天的一个晚上,我登门拜访了他。那天老束情绪很好,我主要听他介绍,他从领导班子成员现状到内部机构设置,从版面宣传到经济工作,从报纸发行到广告业务等等都有涉及,可谓如数家珍,娓娓道来。其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点:一是晚报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办报方针是正确的,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。尽管局部的宣传形式可以变,也应该变,但立足基层,面向家庭,坚持为广大市民服务

的宗旨不能变。作为晚报工作者,就是要以此为光荣,以此为自豪,这样才能继承晚报的传统,永葆晚报的风格和特色;二是目前晚报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,比如班子成员心不大齐,队伍比较松散,工厂(主要指排字车间)问题比较多,等等,但这些问题都带有一定的普遍性,其他报社也好不到哪里去,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罢了。在老束介绍的当儿我还不时插话,总的气氛相当随和。最后,我再三表示一定拜他为师,会努力当好助手,请他多多指教,他谦逊地说:“不用客气,我们之间是同志,是同事,不要提老师老总之类。”接着,他对我报到后的工作安排作了说明。这次谈话让我发现,老束并非是传言中的持重威严,可敬不可亲的人物。

晚报另一位老领导冯英子先生,是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、杂文家。他高小毕业,自学成才,解放以前就曾任职过多家报社,29岁时就当过香港《文汇报》总编辑,是中国青年记者公会(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前身)的发起人之一。他的

杂文针砭时弊,辛辣老到,嘻笑怒骂,皆成文章,在全国享有一定声誉。因口部患小中风在医院治疗已有一段时间,我到华东医院去探访了他。他躺在病榻上,面带微笑,连声招呼我坐下,看不出有一丝病态。由于我俩在公众场合不止一次见过面,加上前不久先后同赴江苏吴兴和广东珠海观光考察,而且两人同住一个房间。平时,他没有一点架子,每次我俩相遇时他都会以“法章哥,英子妹”相称搞笑,可见他是一位多么幽默风趣的长者。

由于彼此都很熟识,他一开口就坦率地对我说,你到晚报来我既欢迎又不欢迎,欢迎的是我们已经熟悉,很谈得来,不欢迎的是晚报近年来情况不大好,比较难办。不过,他顿了一会儿又安慰我说,现在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了,我还是欢迎你的。他还扮了一个鬼脸说,我坚决站在你一边,全力支持你的工作。接着,冯先生毫无顾忌地向我介绍了报社的一些真情实况,并郑重指出:读书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、成功之道,可惜现在不少年轻人懒得读书,不肯下苦功,这实在很糟糕,你得好好抓一抓这件事。最后,他提醒我说,到报社后先从调查研究入手,凡事未弄清楚以前,不要轻易表态,一切工作都要注意从规范化、制度化入手。

谭文瑞叔叔哲嗣谭孜兄,昨天短信告诉我,老爷子的书,已钤印,让我去取。还有另外几位的书,也托我转交。

我称谭文瑞为叔叔,是因为他和我岳父母高集、高汾是几十年的好朋友、好同事。他和我岳父曾三度同事:1949前在大公报,1950年后都被范长江延聘到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,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又共同创办人民日报海外版。他和我岳母代表大公报参加了开国大典,共同采写了长篇通讯《震撼世界的一日》。

谭孜的短信,需要两点注释。

一,老爷子的书,指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《四老讽世诗画——池北偶与漫画三剑客》,内容是谭叔叔自己精选的以池北偶笔名写的一百六十多首讽刺诗,和华君武、丁聪、方成三位漫画大师的插图。二,钤印,是一个曲折的故事。这本书是今年5月刚刚印出的,谭叔叔买了几十本,准备签名送人。前面已签了二十几本,还没来得及送,就去北戴河了。谁想到一去不复返。他还留下了一纸长长的名单。那天,我们去谭叔叔家吊唁,谭孜就说了这件事。他说,父亲走了,没法签名了,他准备买一方石料,刻一枚“池北偶”的章,盖在书上,再按名单送人。我说,不要

## 遗泽留香

◆ 张宝林

### 【作者简介】

张宝林 资深新闻工作者,文学硕士,高级编辑。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、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。曾任人民日报市场报副总编辑、海外版二版主编、中国物资报社长兼总编、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、中国残联理事兼研究室主任。著有《偶谈集》《生存记忆》等。

买了,我家里有,回头挑一块给你。开追思会那天,我就把石料给了他。这回看了短信,知道他刻好了。

晚上,我去了谭孜家。张阿姨、谭孜、谭敏敏都在。谭孜拿出四本书,除了我的。这有余焕春、保育钧、杨良化的。

这是一本装帧精美的书,大32开,封面用麻纹淡米色加厚纸,四角印着四位作者的漫画像,一看就是“小丁”的手笔。封面题词黄永厚。外面还有一个精装硬面布皮半截书套,也压印着四老的头像和书名。

翻开扉页,夹着一张纸,上面印着这样一段话:

今年七月二十一号,父母在报社的安排下去北戴河避暑。原定八月三号回京,不料第二天傍晚,父亲在下台阶时失足跌倒,造成严重的脑外伤和颅内出血。之后又诱发了急性呼吸窘迫症,一种治愈率很低的外伤并发症。尽管医护人员日以继夜地抢救,但父亲毕竟年事已高,最终回天乏力,于二十九号凌晨与世长辞,享年九十二岁。因此,这本书便成了父亲的绝笔之作。

过去的一年里,父亲为这本书的问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。在去北戴河的前几天,他收到样书,又购买了一些成书,准备回来后签送亲朋好友。如今,他的这一愿望再也无法完成。俗话说,“父债子还”。按照他生前拟定的名单,我替父亲送上这本遗作以了结他的心愿。

父亲生前总想得到一枚池北偶的名章,但一直没能如愿。今天我手刻了一枚,虽然不够专业,但我相信父亲一定会喜欢,因为他寄托了我们的思念。

最后,填“诉衷情”一首,和印章一起为此书送行:

一生摇笔做文章,/传世不成行。/另辟无腔野调,/句句显锋芒。

开素卷,/鉴衷肠,/点迷方。/楼空人去,/蕊尽枝残,/留我余香。

【注】父亲称自己的诗为无腔野调,曾用作书名。

谭孜(签名)2014年8月 这页纸上,印着一方闲章,正是“无腔野调”,而那方“池北偶印”,钤在书名页的下方。我问他,什么时候学刻印的?他说,没学过,以前,只刻过自己的一枚名章,这两方是他第二个和第三个作品。这倒让我吃了一惊,因为章子虽然不够专业,但也像模像样,不像出自新手。让我吃惊的还有——他会填词。以前,我只知道他是高级工程师,从来没见过他写过诗词,一定是遗传基因起了作用。

回到谭叔叔。他是做了一辈子记者的人,回来又做了人民日报的总编辑。一生写的报道、评论数以千计,但到了晚年,他并不想编辑一本自己的文集。我曾经当面问他,他说,都是奉命文章,没什么价值。后来,我看到一篇他2006年写的文章,题目是《我的自白》,里面有一段话:“我摇了一辈子笔杆子,写过数量可观的文章,然而有价值的不多。其中有的是赶任务的急就章,仓促成文,未及推敲;有的宣传味道较重,主观片面,甚至

强词夺理,今天重读,不免汗颜。”我想,这话应该不是矫情,而是真实情感的流露。

我又想起念研究生时的一件小事。那时,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商恺兼任社科院新闻所所长。有一天,在人民日报大院里碰到他,他让我到他办公室坐了一会儿。临走,送了我一本书,书名已记不得了。那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。他说,不好意思,这就是我当了几十年记者写的东西,出版社要为我们这些老同志每人出一本,实在挑不出像样的东西来。

当时我就想,商老师说得一点不错。解放后,常年搞运动。他们这辈人,虽然才华横溢,但因为受到历史条件和当年办报的局限,就像谭叔叔自己说的那样,赶任务的急就章比较多,宣传味道比较浓,有的文章就会显得主观片面,不值得留存。当然,也会有些比较中性的文字,但那要花大海捞针的工夫。

两位老记者,还都是老领导,不约而同地说,他们写的东西“没什么价值”。谭叔叔以九二高龄去世以后,人们写悼念文字,津津乐道地也就是那么一篇《告台湾同胞书》。他自己也只对自己的讽刺诗“池北偶谭”情有独钟,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呢?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。北大旁听,已十余年,回首往事,感慨万千!回忆与张岱年、许智宏、厉以宁三位北大教授的交往故事,又一次让我重温北大的游学岁月。

我与张先生的结识,纯属偶然。1996年初到北大,在三角地博实商场,遇见一位拄拐杖的长者,因所需文具售罄,而落了空。当他无可奈何,准备打道回府时,我主动向前对他说:“如果方便,请留个地址,我帮您去校外购买。”张先生没有一点戒心,毫不犹豫地留下家庭住址。真是有眼不识泰山,他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学界泰斗——张岱年先生。

我到校外,转了几家商店,最后终于买到了先生需要的二盒复写纸。送货上门,张先生连声道谢。他的家人,沏茶倒水,热情招待。先生与我,边喝茶边攀谈起来。当我提及

### 【作者简介】

柳哲 从事曹聚仁研究,中华姓氏大讲堂创办人,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,中华大族谱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。著有《柳氏名门》等。

曹聚仁时,他十分激动,告诉我说,在那特殊时期,曹聚仁在著作里,曾不止一次地肯定过他。

临走时,他执意要付钱给我,我连连摆手说:“一点小钱,不成敬意。我倒真心想求先生赠书一册。”他欣然应允,从书架上,找出一册厚厚的《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》,签名后送给我。依稀记得签名内容:“柳哲同志惠存,张岱年,1996年6月15日于北大寓所”。我如获至宝,倍感珍贵。

以后的日子里,他对我关怀备至。1998年4月,应邀为纪念曹聚仁

## 北大旁听二三事

◆ 柳哲

先生题词,支持筹备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;2001年4月28日,应邀为“北大边缘人”题词:“追求真理,振兴中华”,支持“倡导北大游学”;2004年春季,应邀为《柳贯诗文集》题签书名,支持我研究先祖,元代著名学者柳贯。

我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,也有过令人难忘的交往。他学问渊博,思想明睿。为人谦和,乐于助人。提携后进,不遗余力。敢于直言,勇于担当。

2004年,光华管理学院举办讲座,闻讯而来的听众,挤满了楼道。讲座组织者,以教室满员为由,把不少听众挡在了门外。其中不少远道

而来的校外人士,个个心急如焚。这一次,我恰巧也在被拒之列。情急之下,我就去找时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厉先生,向他说明了究竟。我说:“教室过道与门口,还有一些多余的空间。站着听讲,也没关系。恳请厉院长‘开恩’。”厉先生听毕,与我一起来到门口,对组织者挥手示意,允许进入。我们心怀感激,鱼贯而入。

光华管理学院的开放程度,有时不亚于北大中文系。一开学,该学院就会在公告栏内,张贴课程表,既方便了本校学生的选课,也便利校外人士“按图索骥”旁听课程。这种开放办学的风气,也许与厉先生的

胸襟有关。

我与北大校长许智宏相识,也是我的一次特殊经历。大约七八年前,我在旁听北大中文系课时,北大校长许智宏,就坐在我的身边。

课后,我们与他进行亲切交流。无论再忙,一年当中,他都要抽时间,带领相关人员,亲自到教室,旁听北大教授的课程,不仅可以了解教学情况,而且也可自我“充电”。许校长知道我们是北大旁听生,给予了充分肯定。

记忆

双周刊 第404期